

香月清司与卢沟桥事变的扩大

张 皓

香月清司（1881年10月6日—1950年1月29日）是日本著名法西斯军人，他认为自己一生最“辉煌”的经历是在1937年7月11日至8月26日任驻屯军^①司令官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香月清司声称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使日本国民“普天同庆”，他作为“在华北一带活跃的将士的代表”，对于“发生在天津驻屯军阵地内的这次事变”感到“最大的欣慰”。^② 学术界考察了“香月细目”的本质和出笼情况，也提到了香月清司与宋哲元的会面，^③ 但这些考察还仅止于片断，对香月清司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仍有很大研究空间。本文在吸取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香月清司作为驻屯军司令官是如何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

一、香月清司出任驻屯军司令官

香月清司出任驻屯军司令官，要从日本对华北“明朗化”政策的确立和对华发动全面战争气焰的高涨说起。1935年8月，多田骏出任驻屯军司令官，与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参谋副长的板垣征四郎“紧密合作”，企图“由中国方面有志之士成立自治政权，脱离南京束缚”。^④ 1936年1月13日，日本军部提出《华北处理要纲》，将“明朗化”概括为“援助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自治的实现”，由驻屯军负责完成。4月，驻屯军司令官由田代皖一郎出任，升级为天皇“亲补”。8月，日本军部制定《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出笼《第二次华北处理要纲》，次年2月又出笼《第三次华北处理要纲》，将华北“自治”改为华北“分治”，声称

-
- ① 1901年，日本根据《辛丑条约》规定的驻屯军队特权，设置“清国驻屯军”。1912年4月，改称“支那驻屯军”，通称“中国驻屯军”。由于驻扎在华北，又称“华北驻屯军”。由于司令部在天津，亦称“天津驻屯军”。有时简称“军”。1937年8月下旬，日本撤销驻屯军，编组“华北方面军”。
 - ② 香月清司：《陣中より》，豊橋聯隊区管内出征将士事跡編纂会：《日支事变と我等の郷土》第1輯《盧溝橋事变より大山太尉遭難事件まで》，東京：豊橋聯隊区管内出征将士事跡編纂会，1938年，第118、117頁。
 - ③ 如荣维木指出，“香月细目”是宋哲元和香月清司商定的，是香月清司欺骗宋哲元和第29军的烟幕弹。（荣维木：《“香月细目”之考察》，郑自来、董立仁主编：《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要在华北“建设起巩固的防共亲日‘满’的地带”。^①在此过程中，少壮派军人于1936年2月制造“二·二六事件”，近卫文麿称其影响在于主张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向英美挑战的统制派“将对苏派之皇道派一扫而光”，这不仅是引发全面侵华战争也是引发对英美战争的“契机”。^②至1937年6月中旬近卫组阁时，日军迫切希望“一举以武力征服中国”。^③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决定撤换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东京电称：“（1）现任司令官田代患心脏病，卧床已久，对军务之遂行，陷于困难状态。（2）华北之形势已重大化”。^④有学者认为，“作为陆军中的‘支那通’和稳健派的田代，在这个重要时刻卧病而死，对于中国方面来说很遗憾”。^⑤驻屯军司令官新任人选有香月清司、小矶国昭、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矶谷廉介，最终香月清司因“负有盛名，并且事实上非常胜任这一职务而入选”。^⑥

第一，香月清司拥有丰富的个人资历和特长。他“是明治三十五年（1902）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四期毕业生，初服务第十三联队，常（应为曾——引者注）参加日俄战争。在陆军省做过副官及兵务课长，在军队方面做过中队长、联队长、旅团长及第十二师团长，又任过陆大的兵学教官及步兵学校的教育部长”。1936年2月，香月清司出任近卫师团长。1937年2月，出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他“性格谨严。欧战后曾留学法国五年，为现时步兵战术的权威者。平时饮酒赋诗，有儒将的风度”。^⑦对于指挥陆军在中国作战来说，他是合适人选。

第二，香月清司“系主张对华强硬的中坚分子”，^⑧并了解华北局势。他曾任关东军旅团长，率部驻扎辽宁铁岭。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时，他主张进兵山东。1932年初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回日本担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香月清司代理司令官职务。与在沪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相呼应，香月清司“唆使汉奸组织便衣队，扰乱天津，以分散我方（即国民政府）对沪战的注意力，并以淆惑人心”。随即，他协助土肥原“挟溥仪潜伏东北去充傀儡”。^⑨1937年5月，他对在华日军进行为期一月半的视察。6月5日，提出报告：“华北局势相当逼迫，因此对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虽然也许马上还不能增兵，但是最少希望增强在热河方面的兵力，以备华北方面使用。”^⑩

日本“所以特意选中他，看了上面的经历”。^⑪卢沟桥事变后，7月12日《盛京时报》报道：“杉山陆相、梅津次官等各首脑彻夜密议，果然于午前七时招致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香月中将予以重大使命”。^⑫香月清司声称是“在复杂微妙的局势下突如其来担任现职”，但是“果然”与“招致”四字显示他本人要求担任重大使命，他“认为自己被派到中国是为了‘严惩暴虐的中国人’”。^⑬

① 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東京：株式會社原書房，1979年，第347、356頁。

② 共同通信社《近衛日記》編集委員會編：《近衛日記》，東京：共同通信社，1968年，第136—137頁。

③ 近衛文麿：《平和への努力：近衛文麿手記》，東京：日本電報通信社，1946年，第2頁。

④ 《日本駐屯軍司令由香月清司繼任》，《大公报》（天津）1937年7月12日，第4版。

⑤ 秦郁彦：《日中戦争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11年，第205頁。

⑥ 春仁王：《支那事变初期二於ケル北支那作戦史要》（第2卷），國立公文書館藏，第978頁。

⑦ 解放社：《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年，第281、282页。

⑧ 秦郁彦：《日中戦争史》，第205頁。

⑨ 解放社：《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第282页。

⑩ 日本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变陸軍作戦》（1），東京：株式會社朝雲新聞社，1975年，第133頁。

⑪ 解放社：《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第282页。

⑫ 《香月负重任飞某地》，《盛京时报》1937年7月12日，第1版。

⑬ 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上，郭伟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56页。

“决定命运的日子是7月11日”，^①日本接连采取有步骤的行动。凌晨4时半，香月清司接到“亲补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之令。8时半，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指示他：“确保由渤海湾至北平间的交通线，并保护以上地区之日本侨民”，为此“阁下应对陆续增加之部队统一进行指挥”。^②18时24分，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21时40分，载仁下达紧急动员令，日本军部作出《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协定》，规定“关东军的约两个混成旅团及其他必要部队、朝鲜的一个师团、国内的三个师团及其他必要部队”，^③“均立即向华北出动”。参谋本部对香月清司说：“运送国内动员之部队，自动员结束之日起约需一个月的时间。”即是说，他需要在一个月内拖延谈判，等待日本国内兵力到达，发起全面侵华战争。裕仁天皇对他充满厚望，派人传话“关于此次华北事变，陛下对其扩大至为矜念，此节谅为阁下所充分考虑者”。他表示“决心不有伤皇威，不有损皇军荣誉”。这样，他“昂扬出发”^④登场了！

二、香月清司发动战争的部署和步骤

香月清司受命时感到“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之间尚未取得完全一致之意见”：陆军省“仅强调此次事件的不扩大。而对大至国策、小至政府对于此次事件的政策，均未做任何指示”，参谋本部“则使人立即有形势极为紧迫之感，即是说，诸如立即做出必要的派兵，国内数个师团的立即动员以及山东作战之意向等，使人感到这完全是对华全面作战的开始”。他与参谋次长今井清商定：“应引导对华作战速战速决，务期对‘苏’作战时万全无失。”基于此一看法和上述“派兵”声明，他认为“事变正在急速转变之中”，^⑤“参谋本部所预料的那种对华一战的不得已的形势正在出现，因此驻屯军必须做好对中国作战的准备。”^⑥可见，他还未到任就决定，如果不能“和谈”实现华北“明朗化”，就“对华一战”。

1937年7月11日香月清司在平壤与南次郎、小矶国昭和第20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商谈；7月12日，飞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协商。小矶国昭提出“应以此事态为契机，实现征服中国之雄图”，^⑦植田谦吉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提出“乘此时机给予冀察一击”，^⑧三方之间协商“如何解决在黄河以北的华北作战问题”。^⑨今井武夫指出：小矶国昭“唆使香月乘机对中国方面采取强硬态度，声称解决多年悬案的中国问题赖此一举。香月似乎也暗自下定了决心”；

① 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李述一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22页。

② 香月清司：《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孙祥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8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6页。

③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资料室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第36页。

④ 香月清司：《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85号，第66、66—67、70、67页。

⑤ 香月清司：《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85号，第68、67、68、69页。

⑥ 日本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变陸軍作戰》（1），第175頁。

⑦ 日本防衛庁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0页。

⑧ 日本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变陸軍作戰》（1），第153頁。

⑨ 春仁王：《支那事变初期ニ於ケル北支那作戰史要》（第2卷），國立公文書館藏，第974頁。

“同时，关东军直接派遣的今村均参谋副长及田中隆吉、辻政信两参谋，也曾建议香月采取强硬的解决方针”。^①

7月12日11时30分左右，香月清司抵津，14时接任驻屯军司令官。他“立功心切，积极策划扩大战争”，^②15时下令：“（驻屯）军随着增援的兵力到来，逐渐整備好态势，作好全面对华作战准备”；“飞行第15联队自7月12日起对位于石家庄至德州一线以北之平汉线、津浦线运输情况，以及卢沟桥及长辛店附近之敌情进行搜索侦查”。^③当晚，他召开全体幕僚会议“迅速决定‘驻屯军今后应做什么’的明确方针”；^④会后“一度飞丰台，对部队有所训示”。^⑤该方针和训示内容在《七月十三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以下简称“《情况判断》”）和他给日本军部的报告中表露出来：第一，攻占平津地区的部署。他提出“（驻屯）军将第一次所增加的兵力（包括第20师团）合并使用，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为此，他决定在7月20日前完成部署：河边正三旅团主力部署于丰台、通州之间，在北平城内及天津各部署一个大队，另以部分兵力警备北宁线；关东军增援的两个旅团部署于顺义、通州；第20师团部署于天津；航空部队部署于通州和天津。第二，玩弄和谈阴谋，掩盖部署企图。他决定：在部署完毕前，一方面要严格监视中国军队是否违背7月11日协议（详后）而“进入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地区”，一方面促使冀察政权实施“七项目”：“（一）彻底取缔共产党的活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排日的中央系各机关从冀察地区撤离。（四）排日团体即蓝衣社、CC团等撤离冀察。（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取缔学生、民众之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等中的排日教育。（七）北平之治安由保安队担任，城内不得驻扎军队。”第三，分三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首先“以主力扫荡北平附近的第29军”，同时对北上之蒋介石嫡系部队“准备作战”，接着在占领平津地区后“依据作战情况可能进入保定、马厂一线”，继之“根据未来的形势变化，（驻屯）军可能进驻德州、石家庄一线”。他要求日本政府“努力唤起国内对华开战的舆论，同时，还应当使对于中国人行使武力的主张的正当性得到正确认识”。^⑥

《情况判断》透露了香月清司的两个目的。其一，要求驻屯军作好开战的行动准备和心理准备。《河边旅团机密作战日志》称：“今晨（7月13日）接到军司令官的命令，士气顿时激昂。过去只把二十九军中一部分看作敌人，对二十九军还当作友军，由于难以辨别，临战时经常受到牵制，真正感到痛苦”。“现在给旅团的命令确定‘二十九军为敌人’，要求第一线部队转变看法。过去的交涉已经不再有效，现在要转移到纯粹的作战上来。”^⑦7月14日，他调集重兵“集中包围南苑一带”，拟首先消灭驻该地的第29军一部，^⑧英国政府得到了日本要在7月15日发

① 今井武夫：《日中和平工作：回想と証言 1937—1947》，高橋久志、今井貞夫監修，東京：みすず書房，2009年，第31—32頁。

② 祿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李玉、吕永和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27頁。

③ 春仁王：《支那事变初期ニ於ケル北支那作戰史要》（第2卷），國立公文書館藏，第985頁。

④ 香月清司：《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85号，第69頁。

⑤ 《香月昨视事一度飞丰台》，《中央日报》（南京）1937年7月13日，第1张第3版。

⑥ 春仁王：《支那事变初期ニ於ケル北支那作戰史要》（第2卷），國立公文書館藏，第986—987、987—988、988—989頁。

⑦ 日本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变陸軍作戰》（1），第178頁。

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 蒋何宋等密电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起攻击的情报。^①其二，制造开战理由。日方声称“七项目”是“7月11日双方协议”的具体化。^②国民政府指出，日方所提“均为日方离间冀察当局与中央政府间之感情，为其大量增兵华北的缓兵之计，俟日本大军齐集，即为局面展开之日”。^③若第29军不接受“七项目”，香月清司便认为中方无“诚意”，就会“行使武力，以贯彻要求”。^④

收到《情况判断》后，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于7月13日20时修定《处理华北事变方针》（以下简称“《方针》”），由杉山元、载仁7月14日联名电报给香月清司；并派人专程飞津传达：第一，“今后仍应坚持局面不扩大、现地解决的方针，极力回避陷入全面战争的行动。为此，同意向第29军代表提示，并于11日午后8时签字的解决条件，要监视其实行。”第二，“当中国方面无视现实解决条件而表示没有诚意实行时，或南京政府继续调动中央军北上企图发起攻势时，应采取果断的行动。”第三，不但“国内部队的动员，暂待形势演变而后决定”，而且“将新编航空部队的大部集结于锦州、山海关附近地区，由中央直辖”，香月清司“采取果断的行动”时“应事先经中央部的批准”。^⑤《方针》和《情况判断》表面上似有不同，《方针》规定避免全面战争，为此对日本国内部队动员问题、航空队指挥权问题作出不利于香月清司发动战争的规定。但两者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方针》仍给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开了大门。

香月清司与陆军省的矛盾在于，陆军省认为，“有必要再次确立对当地驻屯军的领导”。^⑥香月清司指责陆军省干预其军事部署，声称“前线最高司令官毕竟肩负重任，即便军衔低微，也应负全责”。7月15日，他提出《中国驻屯军关于第一期的作战计划》：第一，分两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即“首先将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南地区。”接着，“以现有兵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在增加兵力后进入石家庄、德州一线，与（中国）中央军进行决战”。为此，他要求再从日本国内动员3个师团来华由他指挥。虽然他将三步改为两期，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骤未变。第二，对第一期作战部署与目的作了更明确规定。他再次强调7月20日前完成作战准备，河边旅团主力部署于丰台；独立混成第11旅团部署于高丽营；独立混成第1旅团主力部署于怀柔；第20师团部署于天津至山海关一线；“集成飞行团和军直属部队部署于天津”。这一部署同前述有所变化，主要在于以河边旅团担任主攻。作战一开始，由河边旅团和第11、第1两混成旅团“将位于北平西郊的中国军队第37师一举击败，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同时“将位于南苑之第38师（之一部）一并攻击之”；“由川岸兵团随时将第132师击败”。^⑦他还矢志称，如果日本军部认为其“举措失当”，则“莫若首先以杰出人物更替驻屯军司令官为宜”。^⑧

受香月清司影响，日本军部认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已经到来”，明确赞同分两期发

① Kenneth Bourne and D.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45, China*, New York: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7, pp.72-73, 43.

② 東亜局第一課：《支那事变関係執務報告》（上卷第1冊），東亜—47，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③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至十二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0年，第113页。

④ 春仁王：《支那事变初期ニ於ケル北支那作戰史要》（第2卷），國立公文書館藏，第988頁。

⑤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资料室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45、46页。

⑥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26页。

⑦ 春仁王：《支那事变初期ニ於ケル北支那作戰史要》（第2卷），國立公文書館藏，第996、997、998—999頁。

⑧ 香月清司：《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85号，第74页。

动全面侵华战争，要求香月清司目前“确保现在的第一线之线（怀柔、顺义、通州、天津一线），在增加的兵团主力未来到前，避免与敌主力决战”；^① 拟定《华北兵力行使之际对华战争指导纲要》，规定在河北北部消灭第29军。陆军省提出“最后谈判方案”，训令他：“一、以七月十九日为履行协定的最后期限，最少限度：1、宋哲元正式道歉；2、处罚负责人冯治安，罢免其师长职务；3、撤走八宝山附近的中国军队；4、要求在十一日解决条件上改由宋哲元签字。二、中国方面如不在期限内履行日方的要求，日方则停止当地谈判，并对第二十九军实行武力讨伐。”^② 可见，日本军部授权他在《情况判断》中提出的“七项目”进行交涉，强调不仅要“使中国方面履行我方要求事项的态度有所软化，也要使第二十九军从永定河右岸地区撤走”；为此赋予其极大权力，即“由现地军自行酌情处理”。^③

日方声称限期7月19日履行协定“并不意味着战争”，^④ 但实际上是向中国发出通牒。香月清司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玩弄谈判骗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三、玩弄“现地解决”，提出“细目”和“细目”之外的“细目”

日本军部在向香月清司下达“最后谈判方案”时曾考虑撤换他。蒋介石得到情报：“日军部将派现役大将寺内寿一来津，担任日军总司令，指挥各部作战。”^⑤ 这给香月清司带来压力，他辩称自己“始终饱受隐忍自重之苦，尊奉帝国中央制定的不使事态扩大，坚持现地解决的根本方针，始终致力于事变的和平解决”。^⑥ 日本政府指示他在7月11日协议基础上进一步要求第29军让步，该协议规定：“一、冀察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遗憾之意，并且处分负责人，更声明负责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二、中国军队为避免与驻丰台的日军过于接近而容易发生冲突起见，不驻军于卢沟桥城廓及龙王庙，而以保安队维持治安。三、本事件多半胚胎于所谓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系统团体的领导，因此将来须采取措施予以彻底取缔。”^⑦ 虽然第29军妥协接受，东京却称“恐日后成为废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指出这“相反却表明我方对协定并无诚意”。^⑧

香月清司于7月12日下午派人同第29军代表就“7月11日双方协议”的细则及实施办法进行谈判。7月14日晚，他又派人向宋哲元提出以“七项目”为谈判基础。有消息称其本人7月15日“提出新要求，冀使华北形成与中央完全脱离之地步”。^⑨ 得到“最后谈判方案”后，他立即“限期”要求“第29军派出有力代表进行道歉”。^⑩ 今井武夫指出：“天津驻屯军内强硬派

①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资料室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49、51页。

② 今井武夫：《日中和平工作：回想と証言 1937—1947》，第31页。

③ 日本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变陸軍作戦》（1），第198、199页。

④ The Foreign Affairs Association of Japan, *The North China Incident (1937)*,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⑤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58页。

⑥ 香月清司：《陣中より》，豊橋聯隊区管内出征将士事跡編纂会：《日支事变と我等の郷土》第1輯《盧溝橋事变より大山大尉遭難事件まで》，第117页。

⑦ 今井武夫：《日中和平工作：回想と証言 1937—1947》，第29页。

⑧ 日本防衛庁戦史室編纂：《日本軍国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上）——〈大本營陸軍部〉摘譯》，第313页。

⑨ 华美晚报编：《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7月份，第23页。

⑩ 香月清司：《陣中より》，豊橋聯隊区管内出征将士事跡編纂会：《日支事变と我等の郷土》第1輯《盧溝橋事变より大山大尉遭難事件まで》，第117页。

要求把谢罪者由最初预定的师长升级为军长宋哲元，把处分的责任者由团长升级为师长冯治安，这样不但逐步提高级别、指定姓名，处分条件也十分苛刻，故意刺激中国方面的神经。”^① 面对压力，第29军提出妥协办法：（1）“7月18日，由宋哲元道歉”；（2）“二、三日内处分责任者营长”；（3）“对将来的保证，待宋道歉回到北平后实行”；（4）“以上写成文件。但即使罢免排日要人，也不能写于文件内”；（5）“北平市内由宋哲元的直系卫队驻扎。”虽然香月清司对不处分冯治安不满，但是日方认为“以上大体承认中国驻屯军14日提出的七项要求”。^②

与此同时，香月清司加紧部署“对北平及南苑取包围形势”。^③ 除河边旅团已集结于丰台、通州外，铃木旅团主力于7月14日集结于高丽营，酒井旅团7月16日抵达密云。7月18日，第20师团全部抵津并“占领所有北宁线铁路车站”。^④ 这样，日本调来加强驻屯军的兵力已按计划于7月19日集结完毕。

尽管日军进行大战部署，香月清司仍于7月18日接待宋哲元的“拜访”，其意图在于：

第一，企图将事变责任强加于第29军。日方资料说宋哲元“对于事变的爆发深表遗憾”。^⑤ 香月清司宣称“宋哲元以恭顺态度说：‘此次事件的发生诚属遗憾。鄙人历来热望东方之和平，尤致力于中日间的亲善。因与前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中将交往甚笃，请阁下亦格外惠赐和睦之交，诸事多加指导。本日先行问候致意’”。他答以“本人对贵军长为此次事件所表示的遗憾给予谅解”。^⑥ 按照香月清司所说，“此次事件的发生诚属遗憾”，其实是指宋哲元也不再追究日方制造事变的责任。宋哲元如果表示道歉，就是担当事变的责任，因此强调系“彼此会晤”，且“在友人住宅，声明系私人互会”。^⑦

第二，提出所谓“细目”，企图镇压一切反日活动。关于7月11日协议中道歉一条，宋哲元已表示“遗憾”。关于撤军一条，第29军除同意撤离卢沟桥附近军队外，还同意撤走北平城内的第37师。香月清司宣称第37师反日，要对事变的发生负责。^⑧ 关于取缔共产党、蓝衣社一条，他声称宋哲元“自愿作为协定细节事项向我方提出”，^⑨ 和宋哲元商定由桥本群和张自忠协商。^⑩ 桥本群“严重督促”张自忠接受“细目”，张自忠“似相当难以容纳”。^⑪ 7月19日22时，

① 今井武夫：《日中和平工作：回想と証言 1937—1947》，第31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资料室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30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 蒋何宋等密电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④ “The Consul General at Tientsin (Coldw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ientsin, July 18, 1937, 8p. 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vol. III, The Far East,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54, p. 203.*

⑤ 春仁王：《支那事变初期ニ於ケル北支那作戰史要》（第2卷），国立公文書館蔵，第946页。

⑥ 香月清司：《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85号，第75页。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 蒋何宋等密电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⑧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 45, China, p. 45.*

⑨ 香月清司：《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85号，第76页。

⑩ 春仁王：《支那事变初期ニ於ケル北支那作戰史要》（第2卷），第948页。

⑪ 《张自忠对日侧要求于受诺似有难色》，《盛京时报》1937年7月20日，号外第1版。

香月清司声明如不接受,“则日军自二十日正午以后恐至采取独自行动之不得已。”^① 23时,双方签订《第三项誓约文》即所谓“细目协定”六条:“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罢免。三、在冀察范围内,对于其他各方面设置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四、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宣传机关,取缔学生和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和排日运动。”桥本群致电日本军部,明确列出罢免人员、撤去机关和取缔报刊,^② 总之,“凡是日本所不喜欢的,都可以被指为反日加以镇压”,而“这些与卢沟桥事变完全不相干”。^③

第三,企图实现华北“明朗化”,“细目”之外“尚有复杂难点”。^④ 香月清司声称: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构成再次发生不幸事件的因素”,宋哲元就须“出以诚意,做出适当安排”。他恫吓:“塞尔维亚国内的一发枪声,成为世界大战的导火线。”^⑤ 后来担任伪北平市地方维持会财政局长的李景铭7月19日日记说:香月清司要求宋哲元“取消国民党,共同防共。质言之即脱离中央也”。8月3日日记列举说:“大抵日本所提条件:一张自忠为河北省主席,二秦德纯免职,三组织自治政府,四共同防共,五华北矿业中日合办。”^⑥ 显然,这就是“细目”之外的“细目”。如果宋哲元同意,则“仍以宋为华北政府首领”。^⑦ 宋哲元对此立场鲜明:“二十九军绝对遵奉中央命令枪口不对内”;“冀察领土主权不能任人侵犯。”^⑧ 因此,香月清司指责“第29军无视事件的解决,对此毫无诚意”。^⑨

四、制造“膺惩”借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香月清司和宋哲元会面,是因为驻屯军“兵力单薄,需要拖延时间,等待增援部队到达”。^⑩ 就在宋哲元拜访香月清司的7月18日,日本军部声称要“膺惩”第29军,对英国驻日使节宣称:“日本国的立场是坚定的,所有海外远征的军事准备已经完毕,即使演成第二次中日战争也

① 《廿日正午以后或采独自行动》,《盛京时报》1937年7月20日,号外第1版。

② 北平陸軍機關長:《第3項誓約文》,支那一支那事变全般—168,日本防衛省藏。

③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 45, China, pp. 45, 54.

④ 《宋访见香月道歉》,《盛京时报》1937年7月20日,第1版。

⑤ 香月清司:《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85号,第75、76页。

⑥ 李景铭:《芦沟桥事变后北平闻见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6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05、112页。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 蒋何宋等密电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⑧ 王冷斋:《卢沟桥事变始末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卢沟桥抗战记事》,北京:时事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⑨ 香月清司:《陣中より》,豊橋聯隊区管内出征将士事跡編纂会:《日支事变と我等の郷土》第1輯《盧溝橋事变より大山太尉遭難事件まで》,第117页。

⑩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中日战争》,金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97页。

在所不惜。”^① 7月20日，参谋本部声称：“帝国认为以外交谈判终究不能解决事变，为使平津地方安定，现在必须决定使用武力。因此，应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给予新的任务。”^② 香月清司一方面下令日军完成对卢沟桥地带的“攻击准备”，^③ 一方面以卢沟桥第29军驻军“向日军开枪为由，以最后通牒致冀察当局，要求我军撤离卢沟桥，并限午前答复”。宋哲元“以国军防地绝非外人所能干涉，未予答复”。^④ 7月21日，日本使馆声称：“决以武力实现华北明朗化”，俟板垣征四郎师团等部“到津即开始行动”。^⑤ 自7月22日起，日军“机械化部队及大量重汽车皆极秘密向华北输送”，^⑥ 至7月25日驻屯军对平津地区第29军完成包围态势。今井武夫宣称：至此，对华开战的准备已经完成，“其发动仅仅是时间问题”。^⑦

日军部署完毕后，香月清司即着手寻找事端。他威逼宋哲元同意其四项要求：（一）“除三十八师外其他驻冀二十九军均移驻保定以南”；（二）由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日军须增加军队“协防”平津地区，“以监视冀察当局之彻底”并“取缔抗日及实行防共”；（三）“免戈定远张光墉职”；（四）“允许日方在平津线附近建筑三个补助飞机场”。^⑧ 这种无理至极之要求理所当然遭到拒绝，香月清司随即制造廊坊事件、广安门事件，“作为对日本国民宣称膺惩中国最好的材料”，^⑨ 诡称：

（第29军）多次切断我军用电线，妨害我军通信。同时，还不断对北平我国侨民进行侮辱，且危害不断加剧；暴力抵抗我军的言语也不绝于耳，其对我态度日益恶化。遂于7月25日夜，射击我在通知对方后而派出的为修理廊坊附近被切断的军用电线的士兵，以数倍于我的兵力进行攻击，致使战斗发生。26日，在北平广安门外，在取得城墙上中国军队谅解的情况下，奉命进入北平市内部队入城时，当汽车刚刚通过城门，城墙上的中国军队便猛烈射击。这是十分恶劣的计划，所谓欺瞒以至于此矣。像这种事件，即战事的真相，完全不是平时两军对彼此的态度，恰如强盗的行为，真是没有道义的行为。……虽然皇军最初为了名誉，采取了隐忍自重的态度，但这如何寄希望解决呢？……不得已断然采取解决中国军队的激进方式。^⑩

宋哲元在7月26日致蒋介石、何应钦数电中，汇报了香月清司如何制造廊坊事件与广安门事件：“日兵三百名于有未（25日13时至15时）陆续开抵廊坊（原文如此，下同——引者注），当夜十二时，突向我廊坊驻军袭击”。“今早八时，日军又由天津开抵廊坊千余名，同时并以飞

①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 45, *China*, p. 76.

②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资料室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56页。

③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04页。

④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至十二月份》，第154页。

⑤ 何智霖：《〈阎锡山档案〉选录——卢沟桥事变史料》，《国史馆馆刊》复刊第31期，2001年12月。

⑥ 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6年，第230页。

⑦ 今井武夫：《日中和平工作：回想と証言 1937—1947》，第33页。

⑧ 《徐永昌日记》第4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87页。

⑨ 秦郁彦：《日中戦争史》，第221页。

⑩ 香月清司：《陣中より》，豊橋聯隊区管内出征将士事跡編纂会：《日支事变と我等の郷土》第1輯《盧溝橋事变より大山大尉遭難事件まで》，第117—118页。

机十四架、装甲车数辆，向我当地驻军猛烈轰袭”。“今日下午七时，敌用载重车三十余辆，载兵约五百名之谱，由广安门强行入城，经我守兵阻拦，不服制止，以致互相冲突。”宋哲元终于认识到香月清司“有预定计划，大战势所不免”。^①

根据日本军部“在现地发出最后通牒，开始作战行动”^②的指示，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通牒：“贵军如仍有事态不扩大之意志，应首先令配置于芦沟桥及八宝山附近之第三十七师限于明日（二十七日）中午退去长辛店，且北平城内三十七师亦由北平撤退。又西苑之三十七师部队首应通过平汉路以北地区，限于本月二十八日中午移往永定河以西地区，尔后此批军队再陆续开始向保定方面运送。如不实行，则认为贵军无有诚意，虽属遗憾，日军必不得已出以独自行动。”^③显然，“此即局部宣战之变形”。^④宋哲元报告国民政府：“此种要求，实属无理之甚，均已严词拒绝矣。”^⑤香月清司宣称其通牒“光明正大，并极尽情谊”，指责宋哲元拒绝其无理要求。^⑥

7月26日10时20分，香月清司下令7月27日正午开始总攻第29军。11时，他向参谋本部提出：以廊坊事件为契机，扩大事态，恳请批准“可随时行使兵力”。参谋本部同意“行使武力”，并赋予他“在原有任务以外负责惩罚平津地区中国军队及保证该地方的安定”的任务。^⑦27日晨，载仁下令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谷寿夫第6师团、矶谷廉介第10师团等部队增派华北，由香月清司指挥。28日13时，日军占领南苑，香月清司散发所谓“大日本军布告第一号”，宣称：“大日本帝国使命，常以确立东亚和平与增进中华民众福祉，两国唇齿相倚关系，以期实现共享福惠之宏愿。”而中国军队“不但侮辱大日本帝国尊严，且使东亚和平陷于危殆，必留万劫不复之惨祸”，本司令官“上副天神下应民意，对如斯不仁不义顽妄凶暴徒辈，断然决意加以膺惩”。^⑧8月8日，香月清司在大约20名参谋人员的陪同下骑马趾高气扬进入北平城。^⑨

日军侵占平津，系其“侵略战争之开始”，^⑩载仁7月28日下令作战地区“大致为保定独流镇之线以北地区”。^⑪但是按照既定的两期作战计划，香月清司“以主力进出保定、独流镇一线”，认为只要“予中国军一击”，“即可迫使中国军屈服”。^⑫8月1日，他对日本全国广播讲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 蒋何宋等密电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②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华北事变》，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43页。

③ 《香月日军司令官发出最后通牒》，《盛京时报》1937年7月28日，第1版。

④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167页。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 蒋何宋等密电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⑥ 香月清司：《陣中より》，豊橋聯隊区管内出征将士事跡編纂会：《日支事变と我等の郷土》第1輯《盧溝橋事变より大山大尉遭難事件まで》，第117、118頁。

⑦ 春仁王：《支那事变初期ニ於ケル北支那作戰史要》（第2卷），第1015、1017、1026頁。

⑧ 《香月日军司令官发出安民布告》，《盛京时报》1937年7月29日，第1版。

⑨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 45, China*, p. 63.

⑩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92页。

⑪ 春仁王：《支那事变初期ニ於ケル北支那作戰史要》（第2卷），第1028頁。

⑫ 蒋纬国总编著：《抗日御侮》第3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第96页。

话，宣称必须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今后以中国全体为对手，以求武力解决，或用其他手段。”^①他号召“我驻屯军将士将一起奋进，忠诚于天皇，努力奋战，以达到目的”。^②

对于香月清司以廊坊事件为借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政府是赞同的。7月27日，日本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以谈话称：“华北对日本帝国的安全至关重要”，“中国方面采取彻底的排日抗日政策”致使华北和平屡受威胁，帝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自卫的处置措施”。^③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帝国政府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声明》，进一步声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帝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虽然该声明是“八·一三事件”后发表的，但是重申了风见章的谈话内容，^④重光葵强调就这样“日中战争全面展开了”。^⑤香月清司为此作出“贡献”。第一，他与小矶国昭、植田谦吉等扩大派达成一致，决心乘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有利于促成日本内部扩大与不扩大之争的终止。第二，他提出《情况判断》和《作战计划》，拟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骤和军事部署，要求拥有“自行酌情处理”权；这样，他有条不紊地贯彻了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方针，并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他玩弄和谈骗局，掩护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他提出“七项目”，并依此提出“细目”，进而提出第29军不可能接受的“细目”之外的“细目”。这样，香月清司可以宣称是“不得已”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惩处中国的“暴虐”。他在9月底侵占保定、沧州后为自己这些“贡献”而欢呼：“我，香月清司，是接替病危的田代皖一郎的司令官，在事变发生之际被任命的。接受任命后，依靠帝国的支援，发扬天皇的国威，至今天有幸解决了此次事变”。^⑥

〔作者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责任编辑：武雪彬 责任编辑：路育松）

① 《关于华北事变，香月广播所信》，《盛京时报》1937年8月3日，第1版。

② 香月清司：《陣中より》，豊橋聯隊区管内出征将士事跡編纂会：《日支事变と我等の郷土》第1輯《盧溝橋事变より大山大尉遭難事件まで》，第119頁。

③ 《同盟通信对外放送概訳》，《各種情報資料・北支事变関係情報綴》，情 00014100，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蔵。

④ 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369—370頁。

⑤ 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29頁。

⑥ 香月清司：《陣中より》，豊橋聯隊区管内出征将士事跡編纂会：《日支事变と我等の郷土》第1輯《盧溝橋事变より大山大尉遭難事件まで》，第119頁。